

文章编号:2095-0365(2023)02-0048-07

我国农村文化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形态与发展趋向

——基于文献回顾视角

李德钦, 刘永慧

(江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文化养老作为农村养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老年人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增强其幸福感与获得感的重要途径。窥探当前农村文化养老兴起背后的缘由,可以发现既有国家政策制度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也有老年人出于对自身生活环境适应的需要以及对更高层次生活质量追求等因素的作用;此外,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养老的实践形态主要有自发互助型、资本推动型、政府引领型以及多元协同型等。为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养老的学理研究与实践工作,今后应当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养老领域的关注度,丰富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明确农村文化养老的实践导向应当是为老服务,需要更为注重文化养老工作的实际成效。

关键词:农村老人;农村养老;文化养老;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3.02.07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从全国308个行政村样本调查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3.82%,已经非常接近“老龄社会”的衡量标准。显然,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老年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而在物质需求得到了基本保障的同时,许多老年人又渐趋侧重精神文化层面的养老需求,“文化养老”也因此逐渐成为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新焦点。那么,何为文化养老,其具体的概念涵义是什么?在农村地区,文化养老需求缘何会产生,其背后的衍生逻辑是什么?当前文化养老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践方式有哪些?此外,农村文化养老未来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又该走向何方?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既有相关文

献的回顾以及梳理、分析和总结,试图从中找寻可以回应前述问题的答案,以期为今后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考。

一、文化养老的概念辨析

厘清和剖析文化养老的本质内涵及其应有之义是指导制定文化养老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组织实施文化养老实践的必要前提。但是,有关文化养老的概念内涵,当前学界尚无统一标准,学者们多是基于不同的视角而赋予其不同的理解,梳理分析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大体上是从三种视域去进行阐释。其一,养老方式说。主要认为“文化养老”是一种养老方式,并且这一养老方式既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精髓的充分映现,也是当代人文精神关怀的明显表征,文化养老为二者的有机结合体^[1]。其二,物质养老相对说。有学者认为将文化养老的涵义概括为“一种养老方式”有失偏颇^[2],文化养老应当是相对于物质(物资)养老而言的^[3],并且物质养

收稿日期:2022-09-03

作者简介:李德钦(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与乡村振兴。

本文信息:李德钦,刘永慧.我国农村文化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形态与发展趋向——基于文献回顾视角[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2):48-54.

老与文化养老之间存在着先后次序的逻辑,即强调物质养老是文化养老的前提,如若前者得不到保障,则难言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4],故而认为文化养老的本质其实是精神养老,是在物质养老基础得以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前提与背景下,从精神文化层面予以老年人更多的心灵慰藉和情感满足^[5]。其三,综合养老说。此类观点认为,文化养老的内涵并非仅是狭义上的与物质养老相对的概念,而应当是精神与物质双重考量下的,涉及与养老相关的思想认同、道德法规以及具体的组织实施等内容的有机整合体^[6],文化养老囊括了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是人类日常生活与行为普遍遵循的思想观念、规范和准则^[7]。总之,从这种视角出发,“文化养老”的涵义是颇为丰富的,其应当涉及到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养老观念、文化伦理、习俗惯例、模式方法、制度机制、活动形式等多方面内容去考量养老的问题^[8]。

总体看来,在强调应当关注老年人物质需求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各种形式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文化满足、精神关怀和心灵慰藉以及提升这类群体的文化福利水平等方面^[9, 10],学者们的观点是相似的,并且这些内容也与文化养老实质倡导的理念较为贴切。但是,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上的国家—社会视角出发去理解和阐释文化养老的内涵,片面强调国家、社会以及社区等层面在精神文化养老当中的作用,侧重于强调自上而下的外在的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而少有基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地从老年人自身的视域出发去看待文化养老,忽略了他们在文化养老中的实际需求、主体地位及其内生动能;另一方面,那些认为文化养老与物质养老是相对的,应当在老年人物质养老需求得以满足、物质养老水平得以提升之后再强调和更为重视其精神文化养老的观点,有过于强调物质养老与文化养老之间的区别之倾向,存在着有意无意割裂了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嫌疑。

尽管文化养老的侧重点或者说其表征形式有所不同,但与物质养老一样,它同样是为了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而服务的,是整个养老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应当是“为老服务”,没有也不应该离开这一本质内核。文化养老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因此理应关照他们的内生需求,同时也需要重视他们在文化养老中的主体作用及其自我能动性的激发。

文化养老与物质养老并非是“养老”的一体两

面,二者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应当过于强调二者之间的顺序先后以及重要程度。实际上,文化养老与物质养老在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当中都是并行出现且同等重要的,不能机械地将二者分离、割裂开来。对于文化养老需求,一些老年人或许仅是没有提及或者没有自主意识到,但这并非意味着客观上的不需要,更非不重要。当处于物质养老需求暂且难以得到保障的时期,看似老年人理应更为注重物质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实则不然。在步入老年阶段之后,与物质养老需求一样,老年人的文化养老需求也是一直都伴随其中的,只是在“吃不饱”“穿不暖”时不得已而选择了自我压制或者将其隐藏起来而已,这并非是老年人理性地主动选择了需求的先后,而是其迫于无奈现实所选择的结果。并非是物质养老暂时得不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文化养老的需求度就不高、重要性就弱化,同样地,也不能在强调文化养老时就轻视了持续性物质养老保障的重要性。

总之,物质养老与文化养老两相并重、缺一不可,彼此之间应当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关系,文化养老与物质养老都应该一直贯穿于老年人的整个晚年生活当中,在任何阶段都应当得到充分保障,二者相向而行,共同为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而服务。

二、农村文化养老的兴起缘由

农村文化养老兴起与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既有国家政策制度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也有老年人出于对自身生活环境适应的需要以及对更高层次生活质量追求等因素的作用。

(一)政策引导说

此类观点认为,各种与文化养老相关的政策举措引领和带动了农村文化养老事业的不断发展^[11]。在直接性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等方面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建设当中;《“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丰富老年人文体休闲生活,扩大老年文化服务供给”,此外,还应该主动“搭建老年文化活动策划展示平

台”,支持和鼓励“老年文化团体和演出队伍登上乡村、社区舞台”。在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引领之下,近些年来,各地基层政府部门亦逐渐更为关注并积极推动文化养老事业和文化养老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广度,由此刺激和带动了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养老需求的增长。间接性政策方面,例如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要“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此类文化振兴相关的政策举措为各地创新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间接地推动和促进了农村文化养老事业与文化养老产业的发展。

(二)时代变迁说

此类观点认为,文化养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衍生而来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12],或者说,文化养老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它的缘起与发展是社会演进的结果^[13]。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持续严格执行、城乡之间社会流动与变迁加速、医疗保健技术进步延长了国民寿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乡土社会状态、农村家庭结构模式以及孝道伦理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然发生了演化与变迁,由此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关爱问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渐突显^[14]。具体而言,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多子多福”生育理念的转变使得农村传统的联合化家庭不断减少,而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则日渐增多。许多中青年由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赡养压力大^[15],加上工作繁忙,故往往只是注重老年人物质层面需求的保障,而对他们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则少有察觉或者无暇顾及。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农村中的许多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求职谋生,而家中老人则成为了孤独的“守巢者”,留守老人现象十分普遍^[16]。这些老人为了缓解孤寂、找寻精神寄托,于是走出家门,走向社区,与其他志趣相投的老人一起组织、参加各类精神文化养老相关的活动^[13]。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农村老人的思想观念、思维

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心态更为积极乐观,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不断提高,与城市老人一样,他们也开始追求创新性、多元化的养老方式,由此推动了农村文化养老的兴起与发展^[17]。

(三)需求层次说

此类观点是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下阐释农村老年人文化养老需求产生的缘由。随着经济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大多数农村老人在衣食住行以及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养老需求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满足,在此基础上,老年人会在情感归属、相互尊重以及成就和实现自我等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方面有更多需求^[11]。显然,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逐渐成为大多数老年人衡量自身晚年生活质量好坏以及幸福度的新的重要指标之一^[9]。对农村老年人而言,文化养老可以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转变传统思维观念并接纳新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对于美好晚年生活的追求^[18]。与此同时,文化养老倡导积极的老龄观,积极发掘老年人潜力,为老年群体赋能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鼓励老年人积极发挥余热,继续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一些低龄健康老人凭借自己在本社区中的名声威望和累积的学识经验,以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到本社区的基层民主监督、邻里纠纷调解、乡土文化传承以及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当中,并且能够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重拾他们的自信与生活价值,获得“老有所为”的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17]。

(四)现实无奈说

首先,从农村老年人自身来看,随着年岁增长,其身心机能也逐渐下降,健康问题愈发凸显^[19];与此同时,在农村社会中,老年人认为自己作用不大,是“等死队”之类的传统舆论思想仍较为盛行。在身体状况欠佳以及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老年人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自暴自弃的状态当中^[20],因此他们亟需找到能够消解此类负面状态的方式和途径。其次,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衍变而言,一方面,农村中的许多老人由于和子辈在生活场域、就业经历以及经济来源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故而容易直接感受到自己在家庭当中的权威渐趋弱化,在与子辈的意见交换过程中,自己意见的分量也在减轻甚至不被认可和采纳,由此诸如悲观、孤寂、自卑等负向情绪也随之产生;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忙碌、有自己的小家

庭生活以及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区隔等原因,子辈实际给到父辈的情感关怀与精神慰藉明显不足^[21]。再者,当前正处于后喻文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场景中,一些人将农村老年人视作是古板老套、因循守旧以及与社会脱节的一群人,许多老年人因此陷入了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身份窘境^[22]。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晚年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同时逐渐更为关照自身精神层面的需求,并试图通过家庭以外的各种渠道和形式来获得与满足自身的这类需求,而文化养老的功能恰好可以与之相契合。

三、农村文化养老的实践类型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在推进文化养老实践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实践形态纷繁众多,各具特色。综合已有研究和具体实践来看,总体上可以依据农村文化养老的主要发起主体不同而大致划分出四种较为典型的实践类型。

(一)自发互助型

这种类型也就是农村老年人发挥自主能动性,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助来丰富和充实晚年生活,并藉此获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进而重新形塑、诠释和升华自己晚年生活的意义与价值^[22]。这一类型的文化养老方式可以分为家庭内部型的互助式文化养老和家庭外部型的互助式文化养老。前者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代内或者代际互助形式来实现。例如行动不便而需轮椅代步的老人由行动仍较便捷的老伴协助前往社区文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等文化场域进行聊天散心、娱乐放松;又如,通过照料自己的孙子女,老年人可以藉此培养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感情,同时又可以丰富生活、增添乐趣,进而获得更多的家庭精神慰藉^[21]。后者主要包括在一些农村社区中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协会、互助养老合作社、“妇老乡亲”模式等等,并且通过提供文化活动现场、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倡导孝道传统等途径和形式为老年人供给物质养老、文化养老相关的产品和服务^[23]。

自发互助型文化养老的显著特征是文化养老的驱动力源于农村老年人自身,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为强烈,并且在互相帮助过程中达到了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引导,倡导和鼓励他们通过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否则,因辨别是非能力有限,一些老人可能通过不健康或者违背道德伦理乃至涉嫌违法的消遣娱乐方式来达到需求满足的目的。

(二)资本推动型

这种类型的文化养老主要是由市场资本发起推动而成。市场资本是指那些在商业市场领域当中较为成功的企业将盈余利润中的一部分投向农村文化养老产业发展当中,旨在拓展投资新领域、开拓新市场以期增加新的盈利来源渠道,亦即这类企业直接将资金资源投向养老领域并供给商业性特色文化养老产品或服务。例如湖州市长兴县顾渚村,如今已是长三角地区颇有名气的老年文化休闲旅游康养地。其缘起于上海的吴瑞安老医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筹资30万元于该村创办的老年乐园。此后,依托当地的茶文化、佛教文化、乡土文化以及优美的生态环境等优势,该村的休闲文旅养老产业日渐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老年人到此地进行休闲放松、文化体验和度假康养,并逐步形成休闲养老产业集群,由此为当地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并极大促进了该村文旅产业的发展^[24]。

市场资本下乡发展文化养老产业,可以为产业项目落址地区的发展带来资本。因此,项目落址地区也应该积极发掘当地相关优势资源禀赋,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探索发展相关产业,并以此逐步带动当地的兴起与发展,从而避免过度依赖外来市场资本,否则一旦资本撤出,当地的发展将会陷入被动。此外,也要谨防外来资本过度介入继而对本地区传统文化养老生态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替代。

除前述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资本以外,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广东以及闽南地区,一些海外华侨或者在外经商的乡贤还会反哺家乡,为本村、本宗族的各类活动捐资献款,这些公益资本在推动当地社区文化养老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25]。

(三)政府引领型

这种类型的文化养老主要是指由政府部门发起和供给的一些文化养老项目。例如六安市霍邱县长集镇老年学校便是党政引领发展村镇文化养老项目的典型。当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贯穿该校运营管理的全过程。长集党委镇政府在校舍、场地方面予以支持的同时,也为校舍的修缮和教学设备的添置调拨专项资金。老年学校也在镇

党委领导下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包括建章立制以明确校长、教务主任等主要责任人的职责以及制定具体的教学管理制度。此外,该老年学校明确老年学员的学习目的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老年学员设置兼顾知识传授与文娱活动放松的教学课程,最大化地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诉求。

这种由行政力量发起的文化养老项目类型在实践中较为容易推进落实,在老年人当中的信任度及认可度也比较高,但是也容易存在管理体制较为僵化、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以及供需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这将不利于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文化养老需求。

(四)多元共促型

农村文化养老问题实际上具有“覆盖广、领域多、个中利益牵涉复杂”等特性,因之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应对。为此,乡镇基层行政部门在发挥党政引领、政策引导、服务供给等职能作用的同时,应该积极探索以财税贴补、公共服务购买、第三方组织孵育等渠道鼓励多方主体参与其中,着力盘活文化养老市场以及老年社会文化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社协作、公平竞争、间接依附等途径嵌入农村社区文化养老事业,继而成为基层公共文化养老服务与产品的供给新主体。北京市朝阳区在多个街道试点组建的“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便是多元协同推进文化养老的典型。此类联合体以行政辖区为单位,将养老照料中心、养老服务驿站、医疗服务机构、各类商户和公共服务商等碎片化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立足社区、辐射居家的养老服务合力,就地就近为辖区内老年人精准供给各类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养老服务^[26]。

多元共促型文化养老,通过统筹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各类服务商等资源,实现养老资源均衡调配的同时又兼顾了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较好地弥补了由单一主体发起的养老模式存在的不足,为推进实现文化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实际上,前述所提及的四种文化养老实践形态远不足以涵盖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养老模式及其特征,今后有待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凝练总结出更多特色、典型的文化养老类型以供学理研究和实践借鉴。与此同时,各地在推进发

展文化养老实践工作的过程中,切忌盲目复刻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的文化养老模式,而是应该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文化养老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地地区的资源禀赋、风土民情以及宗族邻里等方面的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适合当地的文化养老模式。

四、农村文化养老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国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推进文化养老尤其是农村文化养老的全面、深入、持续性研究兼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已有研究为推进解决农村文化养老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路径与工作方向,但也存在可以进一步拓展补充的空间。

第一,提升农村文化养老研究的关注度。老年人的文化养老需求一直存在,但此前却较少得到关注,直至近十多年来才从“养老”领域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领域进行研究;而且,当前学界更为关照和侧重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文化养老,而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文化养老方面的关注则颇为不足,以农村文化养老为主题的研究偏少;进一步来看,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农村文化养老表层的现状描述、存在问题以及策略应对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系统性、整体性地对农村文化养老方面的问题予以分析,层次性与纵深度仍有所不足。今后亟待提升农村文化养老的关注度以及继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由此逐步建立起全面、系统的农村文化养老研究体系。

第二,拓宽农村文化养老的研究视角。首先,现有成果大多是从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切入进行分析研究,事实上,文化养老还涉及到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全方位、宽领域的研究视角有待提高。其次,现有研究侧重于从供给主体的视角出发去进行研究,而以文化养老需求客体的角度为出发点的研究以及供需主客体之间互动交流层面的研究较少。再者,现有研究侧重于混沌地将全部农村老年人均归结为单一群体,并在这样的框架视域下开展相关研究,并且有意无意地侧重和偏向于中低龄、健康和有活力老年人的文化养老需求,而对于高龄、身体残疾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群体需求的关注度则明显

不足。今后,需要加强对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家庭结构以及不同需求层次农村老人文化养老诉求的关注和研究。此外,如何利用现代科技赋能农村文化养老,进而实现文化养老的智慧化、便捷化?能否将当下人们热议的元宇宙、ChatGPT 应用于农村文化养老的理论研究乃至具体实践当中?如何审视和防范数字信息技术在赋能农村文化养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隐私风险、伦理道德风险等等,对此又应当如何加以引导和规制?这些都有待后续深入探究。

第三,明确农村文化养老的实践导向。无论是从文化养老的出发点还是最终落脚点去进行考究,文化养老的本质都应该是为了推动老

年人在文化娱乐、情感关怀以及自我增能等方面的需求得到更多的满足。文化养老中各种形式和意义上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均只是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一种途径、手段和方式,故“文化养老”应当聚焦于“养老侧”,而非“文化侧”。在推进农村文化养老事业与文化养老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要以老年人为核心,始终坚持和不断强化老年人群体在这当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化养老设施建设、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的文化养老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更为注重文化养老的实际成效,更为关照老年人在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中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唐晓英. 传统文化视阈下我国社区文化养老方式探究[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1(02): 44-48.
- [2]方爱清,王昊. 文化养老的基本内涵、当代价值及其可依路径[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2(04):34-37.
- [3]宫兵. 离退休职工文化养老问题及对策[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S1):473-474.
- [4]夏咏梅,彭玉凌.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文化养老探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7,28(07):255-257.
- [5]林晓宁,徐彬. 长春市文化养老消费市场发展实证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20(01):107-112.
- [6]徐娜娜. 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对当代文化养老的影响[J]. 湖南社会科学, 2014(04):10-12.
- [7]陈友华,夏梦凡. 文化养老:概念、问题与建议[J]. 阅江学刊, 2022,14(01):76-84.
- [8]穆光宗. “文化养老”之我见[J].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9(06):132-138.
- [9]邢占军,王从. 生活质量视角下的文化养老研究与政策思考[J]. 理论学刊, 2021(06):140-146.
- [10]黎文普,龚正伟. “文化养老”视域下社区体育文化养老路径探析[J]. 体育学刊, 2014,21(04):46-49.
- [11]王蕾.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山东省“文化养老”路径选择[J]. 泰山学院学报, 2020,42(02):125-131.
- [12]周钢. 论老年人在文化养老中主体作用的主动发挥[J]. 文化学刊, 2019(06):19-22.
- [13]卫松,杨昌儒. 文化养老刍议[J]. 劳动保障世界, 2015(08):34-37.
- [14]李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共融及其发展定位[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21(02): 79-86.
- [15]侯刚波,李艳丽,李宏伟,等. 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创新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3(02):69-73.
- [16]刘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和对策分析——以福州市为例[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3(03):8-13.
- [17]郭如良,李慧聪,刘小春. 文化养老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3(03):18-23.
- [18]邵宝文. 农村新老人文化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农技服务, 2021,38(08):101-102.
- [19]王朋岗,马志越,朱贺,等. “健康中国”战略下农村人口健康问题及其应对[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4(02):56-62.
- [20]申喜连,张云. 农村精神养老的困境及对策[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01):109-113.
- [21]李俏,姚莉. 父慈还是子孝:当代农村代际合作方式及其关系调适[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01): 106-112.
- [22]颜玉凡,叶南客. 新时代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再造机理——基于对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考察[J]. 社会科学, 2020(06):83-92.
- [23]李俏,孙泽南. 合作社养老的实践形态与发展路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1(03):59-68.
- [24]王文龙. 城市生产要素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湖州休闲养老产业典型案例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01):82-87.
- [25]李俏,孙泽南. 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类型与未来走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1(10):98-107.

[26]白维军, 宁学斯. “养联体”: 模式内涵、运转逻辑与

建设路径[J]. 社会保障研究, 2022(04):15-22.

Derivative Logic, Practice For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Cultural Endow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view

Li Deqin, Liu Yonghui

(School of Law,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endowment system, cultural endow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rural elderly to meet their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and acquisition. As for the reasons behind the rise of cultural endowment support in rural areas, factors such as the existing national policy syste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might contribute. There are also needs for old people to adapt to their own liv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ursuit of higher quality life.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practice forms of our country's rural cultural endowment mainly include spontaneous mutual aid, capital-driven, government-led and multi-synergy.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endowment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raise the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endowment in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while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t is also neede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practice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endowment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to serve the aged,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ctual results of cultural endowment.

Key words: rural elderly; rural endowment; cultural endowment; development trend

(上接第 47 页)

Action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and Management Path of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s: Based on Survey of Five Stations in H City

Huang Ziji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new governance pattern of grassroots socie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social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s is the core issue to be addressed by 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ive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s in H city, this paper conducted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action logic,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governance pat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ue to the “survival pressure” and the constrain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selective response”, and it still faces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fiel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and profession. It also puts forward fou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improving policies, capacity building, strengthening connections and innovation empower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s.

Key words: sub-district social workstation; action logic; management path